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征文

内外贸一体化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董 超

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深化内外贸标准认证改革。强化贸易风险防控和摩擦应对，丰富贸易调整援助、贸易救济等政策工具，完善出口管制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

国际经贸格局正在重塑，要以开放增进合作、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有序扩大服务领域自主开放，优化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范围、提升创新引领发展能级，扎实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推动跨境电商加海外仓模式扩容升级。鼓励支持服务出口，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深化外商投资促进体制机制改革，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扩大本地化生产。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

——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12月1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也是我国迈向贸易强国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当前，国际经贸格局深刻演变，大国竞争加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快重塑。在此背景下，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有利于在更高水平上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经济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和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提供重要支撑。

把握丰富内涵和重要意义

内外贸一体化强调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形成内外贸互通有无、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并非简单地让企业“既做内贸、又做外贸”，其要义在于通过规则衔接、市场融通等，实现资源统筹利用、产业迭代升级、经济循环畅通，进一步塑造我国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

一方面，聚焦规则标准衔接，推动企业提质和产业升级。从微观主体的角度看，通过实施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工程，既可以推动企业加快技术创新和管理革新，在参与国际竞争中倒逼自身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又可以通过全球布局生产研发、品牌营销网络，探索多元经营模式，高效联通国际市场，更深入地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从产业层面来看，通过内外贸制度规则衔接融合，实现国内标准与国际先进标准接轨，可以将国际高标准的质量要求、环保规则、技术规范引入国内市场，把先进的生产经验融入国内生产体系，实现技术、品牌、服务等要素优化整合，助推产业转型升级。

另一方面，聚焦市场渠道对接，提升经济循环质量和水平。市场渠道对接是内外贸一体化的内在要求，其关键在于打通内外市场在销售、物流、支付等方面存在的堵点，降低出口与内销市场转换的交易成本，使资金、技术等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推动渠道深度融合能够帮助企业灵活切换目标市场，根据不同需求及时调整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策略，减少因内外贸标准、渠道不同而产生的额外成本，既化解波动风险，又优化产能配置。从畅通经济循环的角度看，通过打通销售渠道，能够让优质外贸产品更加顺畅地进入国内市场，丰富国内市场供给，提升消费品质，更好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高品质需求，进一步激发内需潜力。同时，通过促进产销衔接和供需对接，有助于充分释放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贸易规模优势的叠加效应，推动中国产品、中国品牌、中国标准更好融入国际市场，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

顺应趋势变化统筹内外市场

随着国际分工格局不断调整、内需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和数字贸易的深入发展，企业开展内外贸一体化经营具备良好的现实条件和广阔的发展机遇。需从经营布局调整和业态模式创新两个维度把握趋势变化，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走深走实。

近年来，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价值链加速重构，传统外贸企业的单一经营模式已难以抵御外部冲击。与此同时，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日益凸显，消费升级和产业迭代加快推进。在此背景下，企业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和意愿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打造“同线同标同质”生产线，按国内国际统一技术标准、统一质量管理要求组织生产，所涉及业务领域也从消费品生产向装备制造、中间品贸易延伸，从产品对标转向品牌提升、服务优化。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领军企业同时嵌入国内产业链和国际价值链，主动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研发、生产和营销网络，在更高水平上统筹利用要素资源，逐步成长为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内外贸龙头企业。这种双向嵌入的经营布局，显著增强了企业对冲风险和调配资源的能力，使其能够更好应对外需波动和开拓增量空间。

还要看到，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正在重塑贸易的组织方式和价值链条，贸易形态逐渐向数字赋能、业态融合方向演进。跨境电商、直播电商、反向定制等新业态加速发展，推动制造、贸易、物流、金融等环节紧密衔接。跨境电商依托海外仓、保税备货等模式，可以帮助企业低成本进入国际市场；直播电商以场景化、互动式营销缩短消费决策链条；反向定制则以消费数据驱动生产组织，实现以需定产、降低库存。这些新业态新模式能够帮助企业避开传统交易中的多层中间环节，使其快速、直接触达国内外终端消费者，极大提升供需对接效率。一方面，企业可以同步感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消费变化，动态调整产品结构与营销策略；另一方面，同样的设备和产品能够根据不同市场的需求实现灵活供给，使企业更快切换市场、转换渠道。

聚焦重点任务精准发力

我国已培育2200多家内外贸一体化领跑企业，有数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了内外贸一体化经营，产业体系完整性日益巩固，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具备更加坚实的基础和支撑。但也要看到，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难题亟待破解。例如，内外贸规则衔接不够顺畅，一些外贸企业对国内销售渠道不熟悉，产品适配投入的研发改造成本较大，自主品牌建设经验不足，国际互认范围尚未完全覆盖，综合服务平台和海外服务网络建设还有待加强。站在“十五五”新起点，需聚焦重点任务精准发力，破除相关瓶颈制约，搭建平台，畅通渠道，进一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以有力举措加快内外贸一体化进程，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其一，推动规则制度衔接融合。全面梳理内外贸经营时遇到的体制机制障碍，完善相关政策举措。清理纠正地方保护、市场分割等不合理行为，促进国内外资源要素顺畅流动、优化配置。对标国际先进水平，促进内外贸标准衔接，建立完善国际标准跟踪转化工作机制，转化一批先进适用的国际标准，完善合格评定服务贸易便利化信息平台功能。健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制度体系、工作体系和评价体系，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

其二，培育壮大优质经营主体。支持企业建立自主品牌和营销网络，在全球布局生产制造、研发设计和地区总部，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内外贸并重的领跑企业，增强全球资源整合配置能力。支持供应链核心企业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开拓国内国际市场，引导中小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在优势制造业和新兴产业领域，支持领军企业发展成为全球产业链的链主企业，培育壮大一批内外贸融合发展产业集群。

其三，搭建平台畅通发展渠道。促进内外贸市场渠道对接，搭建出口转内销平台，大力发展“跨境电商+产业带”“市场采购+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模式，建设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支持国内商贸企业与外贸企业开展订单直采，利用直播电商、内容电商等新模式拓展内销渠道，引导外贸企业精准对接国内市场消费需求。促进重点商品交易市场与国外营销网络互联互通，加快推进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引导外贸企业、跨境电商、物流企业强化业务协同，加快布局海外仓、配送中心等物流基础设施网络。

其四，强化政策支持与协同保障。加大财政、金融等政策对内外贸企业的支持力度，整合通关、物流、金融、法律、咨询等全链条服务，充分利用全国一体化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网络、国家产融合作平台。降低企业税负，可考虑对内外贸企业实施所得税减免、出口退税、税收抵免等优惠措施，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完善出口信用保险和国内贸易信用保险衔接机制，扩大承保规模和覆盖面，帮助企业获得更多信贷支持。推动海关、商务、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合作，建立综合风险预警机制，加强对外部风险的监测和协调应对能力。

此外，还应加强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市场分析和精准营销中的应用，鼓励企业建立智能工厂，增强柔性生产和市场需求适配能力，以数字技术赋能内外贸企业提质升级。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党委委员、流通与消费研究所所长）

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的路径

唐 韬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把生态保护好，把生态优势发挥出来，才能持续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的路径”。良好的生态环境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不是简单的生态资源价值变现，而是通过观念革新、实践创新与制度建构，将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过程，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体现保护和发展的协调统一

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蕴含深刻的理论逻辑，其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契合绿色生产力发展方向，彰显发展为了人民的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自然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也是社会生产资料的主要来源。自然生态系统不仅提供矿产、林木等有形物质资源，还提供涵养水源、固碳释氧、气候调节等具有公共属性的调节服务类生态产品。这类生态产品通常难以通过传统的价格机制自动显化，容易造成生态保护成本与收益错配。推进生态价值转化，体现了对生态系统多元价值的认识和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的有效路径。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以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作为重要载体。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与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内在一致性，都强调把生态损益纳入经济活动的评价维度，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节约集约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提供了现实抓手。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推进生态价值转化，就是要将优美的自然环境通过有效途径转化为可感可及的发展收益，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实现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

促进生态与产业双向赋能

推进生态价值转化，关键在于构建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实现生态资源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协同共进。

生态产业化，可理解为依托优质生态环境供给高品质生态产品，推动生态资源价值变现。具体而言，就是以保持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为前提，依托森林、草原、湿地、河湖等生态资源，通过发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作用，有序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文旅等业态，将生态系统的物质供给转化为市场可交易的商品与服务。随着“双碳”目标的推进，碳汇、生态修复服务等新业态不断涌现，森林碳汇、湿地碳汇能够经过标准化计量核算后进入碳交易市场，提供了生态价值转化的可行路径。需要看到的是，生态产业化不是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而是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相统一。

产业生态化，则是聚焦现有产业体系的绿色低碳转型升级，把生态约束嵌入社会再生产全过程。通过对生产方式进行系统性革新，实现产业产出增长同高耗能、高排放生产逐步脱钩。对于钢铁、化工、建材等传统产业来说，产业生态化就是要通过加快“智改数转”步伐，聚焦节能降碳、循环利用开展技术改造，推动产业绿色焕新。在产业链层面，则要求全面推行绿色设计、绿色采购、绿色制造、绿色物流、废弃物回收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构建全链条绿色供应链，将绿色低碳理念传导至上下游各主体。产业生态化的实践指向，就是尽可能减少经济生产活动对自然生态资源的损耗，以较小的生态代价获取更大的社会产出，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协同提升。

释放好山好水蕴含的经济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培育大量生态产品走向市场，让生态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推动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需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打通堵点卡点，围绕交易规则、监管体系、运行机制等全方位推进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进一步释放好山好水蕴含的经济价值。

推动生态资源权益交易。清晰的产权界定是交易的前提。应全面推进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统一确权登记，厘清自然资源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等权利权益。探索绿化增量责任指标交易、清水增量责任指标交易等方式，合法合规开展森林覆盖率等资源权益指标交易。健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机制，将碳排放权、用水权、排污权等交易有序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探索建立用能权交易机制。探索在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创新完善水权交易机制。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完善评价机制和监管体系。应统筹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构建起全域覆盖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建立生态产品价值评价机制，对相关项目开展生态影响前置性评估工作，坚决防范无序开发、变相破坏生态的行为。压实地方政府部门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强化资源开发、产业运营全流程监管，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此外，还要提升全民生态文明素养，畅通渠道，鼓励全民监督生态资源开发利用。

有力提供支撑和保障。聚焦供需两端协同发力，打通生态资源确权、生态产品开发、市场流通消费的全产业链条。着眼于解决绿色产品市场信息不对称、标准不统一、溯源不清晰等问题，健全标准化、规范化的绿色产品市场准入体系，完善绿色消费激励机制，加强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体系建设，细化分级分类评价标准。充分发挥财税、金融等政策作用，探索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工具，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生态产业培育，进一步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作者系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激“蓝”强“海”

黄启才

海洋经济是经济发展的“蓝色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高效开发利用海洋，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些重要论述从战略和全局高度阐明了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性，揭示了经略海洋对于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已突破11万亿元，海洋强国建设的家底更厚、成色更足。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对激发蓝色经济发展动能、筑牢海洋生态安全屏障、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可发挥重要作用。

一是有利于拓展发展空间。我国拥有约300万平方公里的主张管辖海域，广袤海洋蕴藏着丰富的能源、矿产和生物资源，是破解陆域资源约束、缓解环境承载压力的重要载体。推动海洋资源高效整合，有序推进海域分层立体利用，有助于更好地统筹岸线、海域、陆域空间，培育和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洋新材料等新产业新业态，充分释放海洋作为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的潜能。

二是有利于筑牢生态根基。海洋生态和海洋经济相互依存，碧海蓝天也是金山银山。海域无序开发、近海过度捕捞、陆源污染入海等粗放的开发模式，会导致近海生物多样性下降、渔业资源衰退，形成“生态赤字”，反过来制约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协同推进海洋生态保护和海洋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海洋开发方式向循环利用型转变，有助于实现海洋资源永续利用，形成人海良性互动的新格局。

三是有利于促进高水平开放。海洋天然具有流动与连通属性，这赋予了海洋经济鲜明的外向特质，使其发展始终与对外开放深度联系。通过构建互联互通的海洋运输网络、发挥高效集散的港口枢纽功能、打造充满活力的海洋产业生态，能够实现商品和要素顺畅跨境流动，有助于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使我国更好地连接全球市场、深度融入世界经济。

习近平总书记对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高效协同、更加注重产业更新、更加注重人海和谐、更加注重合作共赢五个方面的要求，为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提供了科学指引。

创新驱动，强调实现海洋科技自立自强。当前，我国海洋领域关键核心技术仍存在“卡脖子”环节，部分高端仪器和零部件自主化水平不高。推动我国海洋经济由大向强转变，需把创新摆在突出位置，以关键技术突破带动海洋产业能级跃升。高效协同，强调陆海统筹、区域联动，将陆域与海域视为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进行统一规划、协同治理与融合发展。产业更新，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加快构建技术先进、结构优化、竞争力强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船舶工业等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推动深海探测等新兴领域前瞻布局，有利于夯实海洋强国建设的物质基础。人海和谐，倡导绿色可持续发展。海洋生态系统体量庞大但承载力较弱，必须像对待生命一样关爱海洋，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合作共赢，强调要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海洋有与生俱来的广阔性、包容性，海洋治理关系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共建蓝色伙伴关系，能够为发展海洋经济营造稳定的外部环境。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需锚定海洋强国建设目标，坚持系统推进，以更实举措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将“五个更加注重”的要求转化为具体行动。

健全政策支撑体系。发挥好各地海洋经济发展专项规划的引领作用，打破多头管理、条块分割的局面，立足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的现实基础和独特优势实行差异化发展。用好海洋产业发展基金，鼓励社会资本广泛参与海洋建设，探索发展蓝色债券、海洋科技保险等工具。

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整合北部、东部、南部海洋经济圈科技创新资源。北部可发挥崂山实验室等平台优势，攻关深海重工装备核心技术；东部应深化拓展“人工智能+海洋”行动，促进海洋电子信息等产业发展；南部需强化深海科技创新引领，加速推动电解海水制氢等前沿技术产业化。实行“揭榜挂帅”制度，搭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培育高端复合型科技人才，高标准建设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传统海洋产业提质增效，发展水产品精深加工，加速突破船舶工业智能制造关键技术。培育壮大海洋新兴产业，巩固海工装备全球领先优势，推进深远海海上风电规模化发展。前瞻布局海洋未来产业，围绕海洋空天信息等前沿领域实施产业孵化计划，探索“海洋牧场+海上风电”“海上光伏+海水淡化”等融合新模式，促进海洋多产业联动发展。

优化整合沿海港口群。各主要海湾港口应立足自身禀赋各展所长，进行特色化运营，实现功能互补。同时，加强主要海湾整体规划，统筹航运资源、完善集疏运体系、共建服务平台，推进船、港、航各要素优化重组，建设江海联运、铁海联运等多式联运体系，促进港口数智化、绿色化转型，深化港产城深度融合。

筑牢海洋可持续发展屏障。深化陆海综合治理，严守海洋生态保护红线，推进流域、海湾、海岸带一体管护，实施“蓝色海湾”整治行动。构建立体化海洋观测网络，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提升赤潮绿潮、海水倒灌等灾害的监测预警能力。探索开展海洋碳汇核算，打通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通道。

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主动参与国际海洋技术标准制定，继续发挥好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等重要平台作用，与更多国家建立更广泛的蓝色伙伴关系。深化海洋防灾减灾、跨境污染治理等领域的国际合作，筑牢海上战略通道安全屏障，为全球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作者系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福建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所长）

本版编辑 李子娇 美 编 高 妍